

## 哲学史的符号学透视——迪利眼中“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

周劲松

迪利的工作是 *metasemiotics* 性质的。*meta* 有“元”的意思，所以在这部上千页的巨著《认识的四个时期》中，迪利会从对符号概念的追根溯源开始，把人类的哲学认识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古代哲学时期、中世纪、现代阶段以及后现代时代；按照更精细的考察，*meta* 更具“后设”之内涵，所以这部巨著有个醒目的副标题：“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哲学的首次后现代性通览”。

一部哲学史是一种从事哲学的方式，或者甚至是提供一个引导文本的方式，其目的之一就是帮助读者理解当前的知识状况，给予读者某种启迪——我们怎么走到这里，从这里我们将走向何方。哲学史家罗素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是其所处时代的果，也可能成为塑造未来的因。迪利也坚持认为，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所有的阳光都是今天的阳光，太阳光线无数，而实际落到我们身上的，则取决于我们在时空中所处的位置。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界线上。“如果有个概念对于新兴的后现代意识至关重要，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符号概念。而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没有什么比一种新的哲学史更为根本。”<sup>1</sup>为了前瞻未来，我们必须有所回顾，迪利的眼光深邃，竟然把当代符号学充分放置于作为整体的哲学史视野和语境之中，以求展现从它在古希腊爱奥尼亚的源起到其新近成长为符号学的整个历程。

“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术语来自希腊单词 *δημειον* 的词根部分，该部分翻译到英文中即“符号”（*sign*）。然而，就其本身，*δημειον* 在希腊语中根本不表示如我们今天的讨论所针对的、普遍意义上的“符号”，只表示极其专门的符号形式，尤其是那些同卜筮相关的符号形式，包括名声不佳的神谕、宗教卜筮，以及更为正面一些的医学和水文学中的科学预测，换言之，在古希腊人那里，本体论和认识论如同一硬币的两面，而哲学对存在的最初探索，便开始于对二者之间交缠纠结关系的认识。此可谓符号发展的前符号学阶段，其关注的核心在于事物（*things*）。

---

<sup>1</sup> John Deely, *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p. xxx.

改变古希腊人“自然符号”这种原初涵义的，是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公元354—430），事实上，由于奥古斯丁不懂希腊文，他错误地领会了 *σημειον*，但历史吊诡的地方是，“正因这种无知之幸，他[奥古斯丁]开始谈论总体性的符号，在总体观念这个意义上的符号，……提供了一个主题，让针对它的深入调查研究成为一种值得的自然和文化现象”，<sup>2</sup>符号，作为总体观念的符号，或者皮尔斯所谓“普遍的存在模式”（general mode of being），于是，成为符号学遗产中的头等的、根基性的要素，它标志着符号学意识的真正觉醒，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符号中的存在（being）问题。

从古希腊人的“自然符号”或 *σημειον* 过渡到奥古斯丁的“总体性符号”或 *signum*，我们从希腊哲学花季来到“黑暗的中世纪”。

每一现代哲学史都本质性地关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出，尤其是在十七世纪中以及十七世纪之后。从这个观点看，拉丁世纪后期的许多持续的哲学发展会不在人们视线之内。我们已经习惯性地以笛卡尔作为起点来描述和呈现现代哲学，单纯地将其当作与拉丁传统的科学决裂的组成部分。拉丁人提出而且澄清了关于符号的总体性概念，在这之后现代性登场，这是朝向理解客体的一种新的方式，就这种面向客体的新方法导致“共识性知识”（coenosopic knowledge）从主题和建制上对迄今为止的关于人类理解的崭新事业的确立只能是以“实验性知识”（ideosopic knowledge）的方式确立而言，现代性可谓成功。然而，在刻意将自己同拉丁传统区别开来的过程中，现代哲学企图让自己同现代科学这项事业结盟换来的是更痛苦的貌合神离：它仅仅是尴尬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认识到——迪利引用史蒂文逊的著名小说为喻，警告我们说——杰克博士的内心深处还有着海德先生！

从梳理“符号”概念历程这一角度，迪利又把认识的四个时期表述为：符号概念的开端；概念本身的发展；概念的遗忘；概念的复苏和发展。普安索（John Poinsoot，1589—1644）正是这一脉络上最关键的一位。<sup>3</sup>

“普安索是标志通向拉丁中世纪哲学之夜的晚星。但是，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使得他成为由皮尔斯将之带到黎明的后现代的晨星。”<sup>4</sup>普安索的贡献之一，

<sup>2</sup>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p. 63-64.

<sup>3</sup> C.f. John Poinsoot & John Deely, *Tractatus de Signis: The Semiotic of John Poinsoot*,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10.

<sup>4</sup>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 27.

在于清晰地阐释了符号是关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他关于关系超主观性这一认识，使他超越了中世纪关于“真实存在”（*ens reale*）与“理性存在”（*ens rationis*）之间的纷争——作为关系的符号能够存在于两个领域之中，因而能够通过（作为理性存在的）表意活动捍卫客体同（作为真实存在的）真实事物那种关联关系。

现代哲学忽略了普安索这种思路，走上了唯名论的道路。这条死胡同被迪利称为“理念之路”（the way of ideas），这代表着从普安索所勾勒的“符号之路”（the way of signs）堕入歧途：符号之路是通往唯实论的道路，理念之路抵达的是知者和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裂隙。不幸的是，不仅笛卡尔让我们没入怀疑之海，康德也并没有把我们拯救出来：“现代唯心论的典型特征，正是把从头脑到自然的通道变成‘无通道’，而康德根本没有改变这种状况。”<sup>5</sup>

现代哲学家们似乎都陷于沉思而不是修复这道“张开的裂隙”。不过，皮尔斯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东西，因为“皮尔斯最终动摇了现代性面貌的双支架结构，即，人脑除首先是由自己建构起来的的东西之外别无所知，其二，现代性之前的人，尤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于哲学这里和认识的探求无所贡献”，<sup>6</sup>通过发掘普安索符号关系本体论的意义，皮尔斯让普安索的烛火发展成了真正后现代的黎明，迪利因此称皮尔斯从拉丁人那里复苏 *signum* 标志着哲学中一个新时期的开端。从奥古斯丁之最初提出总体性符号观，到普安索那里得到专门研究和证实，“我们看到的是一道炽热的符号风景，它伴随符号所专属的本体性的相对存在之中的有机统一，超越自然与文化、内在与外在这种分野，在其场地上来回运动，像羽毛球一样，而且根据不断变化的认识环境编织出经验之网，同时它滋养并维系意识和习惯在个体心中的成长，它超主观地为个体们所享有，构成我们以另一种方式称之为‘历史’那种东西背后和其中的现实。”<sup>7</sup>

迪利站在现代与后现代这条分界线上，以符号学家的视角，筚路蓝缕于从古希腊到二十一世纪的整个哲学史的全面检核，而其中最闪光的，就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梳理钩沉，尤其是对被遗忘了的符号学者普安索的全面重估，也许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符号学极大地修正了标准哲学史的轮廓。”<sup>8</sup>迪利的工作中所凸显的从普安索到皮尔斯这条线索，的确可以作为符号学者深入哲学迷宫的阿里

<sup>5</sup>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 18.

<sup>6</sup> John Deely, *The Red Book*, Helsingin Yliopisto, Finland: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00, p. 7.

<sup>7</sup> John Deely, *The Green Book*, Houston: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2000, p. 44.

<sup>8</sup>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 96.

阿德涅之线，以此作为牵引，有机会一览或者是滚滚河流，或者是潺潺溪流，甚至是汨汨地下暗泉这林林总总思辨性思想构造出的哲学史样态。